

「回教圈」的幻影——日本侵華戰爭與伊斯蘭空間的虛構

王柯 日本神戶大學大學院國際文化學研究科教授

在「東突厥斯坦」發現「同胞民族」

1939（昭和14）年11月至12月，由「大日本回教協會」與「東京伊斯蘭教團」主辦的「大回教圈展覽會」在東京的上野松坂屋（11月7日至19日）和大阪的日本橋松坂屋（11月28日至12月9日）舉行。由世界各地被邀請來出席展覽會的40名「代表」，在日本受到了盛大的接待。（註1）

值得注意的是，代表當中居然有9位「東突厥斯坦」的「代表」。而9人的負責人「麻木提·莫合提」的「職務」為「東突厥斯坦原指揮官」。由此可知，被邀請來參加回教圈展覽會的維吾爾族，基本都是新疆近代史上有名的事件「第一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當事者。關於「第一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過程，拙著《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研究》（註2）進行了大致描述。而由日本蒙古軍事顧問部調查部製作、現藏於日本防衛研究所的《回疆獨立運動概說（從獨立戰爭到支那事變）》（以下簡稱《概說》），尤其是第二章「麻木提對日工作實況」，則詳細記載了運動當事者在運動之後，如何與日本帝國主義建立關係的過程。（註3）

按照《概說》的說法，1934年夏季，被推選為第一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時建立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政府主席的和加·尼亞孜（哈密人），由於到烏魯木

齊就任了盛世才政府的新疆省政府副主席，「麻木提·莫合提」（吐魯番人）接班率領他們當年由哈密·吐魯番地區帶來的維吾爾部隊，駐屯在以喀什噶爾為中心的新疆南部地區。其間，麻木提派遣其兄到麥加朝聖期間秘密到土耳其秘密訪問駐土耳其日本大使，「懇請得到日本援助」。由此可知，並非是日本方面主動接近他們，而是他們自己主動接觸和接近了日本帝國主義。也就是說，在中國建設近代國家的過程中被邊緣化了的民族集團，將中日關係的惡化看作是自己擺脫現狀的良機。

之後不久，麻木提接到蘇聯軍隊讓他到烏魯木齊報到的命令，由於感到危險，便於1935年4月流亡印度。到了印度之後，他立即再與駐土耳其日本大使聯繫，而日本大使告訴他們：「應在印度待機，待時機成熟後會立即採取行動。」但是，麻木提的到來被駐加爾各答的中華民國領事所察覺，於是國民政府命令麻木提到南京復命。麻木提則派了兩名軍官作為他的代理去到南京。這兩名軍官於1937年9月2日到達南京，之後面見蔣介石委員長，「報告了蘇聯在新疆省的暴行及因此帶來的居民的困苦，懇請借中央政府之力予以解決。」然而，「蔣委員長回答道，現在中日開戰，當前蘇聯按照密約對中國進行援助，所以在新疆問題上無法反對蘇聯，中日戰爭結束後必當著手解決新疆問題」。的確，在抗日戰爭初期，支援中國的當時只有蘇聯。（註4）

感到失望的兩位軍官，10月2日去到上海，通過當地同志的幫助，於11月17日「以書面報告形式向在上海日本領事詳細報告了新疆及蘇聯的狀況和動向、住民的反共產主義情緒，此後開始和領事館保持頻繁聯絡」。但是，英國方面探知「在上海的維吾爾軍官與日本機關保持秘密聯絡」，於是立即發出了「禁止麻木提繼續滯留印度」的命令。「束手無策的麻木提不得不提交了於民國28（1939）年3月4日之前退出印度的誓約書」，並且「秘密與在孟買日本領事聯絡，……日本領事馬上向本國請示，很快得到本國允許。於是3月2日瞞著英國當局秘密登上由孟買出發到日本的遠山丸，3月23日到達上海，與流亡於上海的十餘名軍官取得聯絡以後，27日出發，4月1日抵達神戶，4月6日到了東京。」（註5）

然而，對於當時的戰爭日本來說，遙遠的「東突厥斯坦」究竟能有什麼價值？關於這一點，《概說》也做了明確的答復：「不僅從軍事的角度，而且從將來治理支那、對抗蘇聯的國防的角度來看，日本確保滿洲、內蒙古、新疆這一鏈接亞細亞中心的地帶都是絕對必要的。該地的回教民族從血緣上來看與日本具有深深凝結，永久不變，一身同體的關係，如果出現一個維吾爾自治國，必將給居住於西邊隣接的同民族占大多數的俄領突厥斯坦以及俄領中央亞細亞一帶的八百萬回教徒以極大的刺激。同時不難想像，如果北上可以使俄領極東地方陷

入孤立，如果南下可以極大刺激印度隣接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日本如果積極援助印度民族應該較易取得成效，那必定會置英國於狼狽境地。這一行動在外交中絕對對日本有利，至少可以使任何歐美國家都無法再插手東洋問題，退後百步專心於保護可能成為最後戰線的海峽殖民地，而日本卻不須通過戰爭即可名副其實地成為東洋之盟主。因此可以斷信，解決新疆問題絕對是一項緊要的工作。」（註6）

有趣的是，與新疆遙遙相隔的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對它插手中國邊疆問題的行為進行正當化，居然使用了「同胞民族」的口實。《概說》提出：維吾爾族人「從全般看來與吾國人相似點極多，的確是值得我們愛護的同胞民族」。（註7）這樣一來，當維吾爾民族被認定為「與日本為通過血緣關係深深凝聚」的「同胞民族」時，便理所當然地產生了一種義務關係：「他們深深信賴日本及日本人，而吾等日本民族當然具有對於這些祖先相同的同胞民族的困境進行之言的義務，這也是我們對於我們祖先要負起的重大責任。」（註8）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與維吾爾族的「同胞民族」關係，同時還是在一個「回教」的空間中被發現的。這也說明，日本帝國主義用來懷柔整個中國穆斯林社會的理論，就是它的「回教圈」話語。

「回教圈展覽會」的舉辦與中國的穆斯林

實際上，1939年11月上旬舉辦的「大回教圈展覽會」的「計畫書」是在當年8月才制定的。也就是說，「大回教圈展覽會」從其規劃到舉辦僅僅只用了3個月的時間。如果沒有日本政府、尤其是外務省和軍部的協助，這種事情當然是無法實現的。「大日本回教協會」也承認，「作為回教對策之一，在外陸海三省的秘密支援下，由大日本回教協會主催」的回教圈展覽會，「得到了我國內外關係各官公署、公私諸團體及回教圈諸國的絕大的支援。」

各國出席展覽會的「代表」具體人選由「大日本回教協會」掌握，然而「代表」的「資格」和所代表的地域，無疑是根據日本的「國策」而制定的。通過當時的日本外交文書檔案，還可以看出「大日本回教協會」對代表的選定標準。例如關於幫助「一直屢屢向本館提供關於新疆情報」的「哈米提·哈吉」渡日內容的、11月2日駐上海三浦總領事給野村外務大臣的「三八六八二」號電報（註9）就能夠證明，這些代表主要是已與日本有聯繫、並幫助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人物。

又如「滿洲」的6位代表，其實都是非常政治化的人物。負責人洪啓濬為「滿洲國第一軍管區司令部部附陸軍步兵上校」，他是滿洲軍中將王殿忠的「代理」；其餘分

別為「(滿洲回教協會)總會總務科長韓鵠洲、協和會中央本部囑託張世海與奈嚕、奉天代表楊進之會長,指導者為民生部社會科宗教係長栗原敏」。(註10)張世海和奈嚕(印度人)所屬的「滿洲國協和會」是一個與行政完全一體化、在關東軍和日系官吏的「指導」下設置的官民一體的教化組織。不用說,「指導者」栗原敏本身是日本人。(註11)

日本政府如此匆忙決定舉辦這次展覽會的目的,當然就是為了通過伊斯蘭教政策而支援戰爭。「回教圈展覽會計畫書」「趣旨」部分中有這樣一句話:「必須看到,如果同時能夠利用此次機會請回教圈諸國攜帶貴重出展品的多數代表來朝,使之觀察事變發生之後我國的實情、加深認識,可以使本次展覽會的意義變得更为重要。」(註12)也就是說,除了向日本社會介紹「回教圈」之外,通過舉辦展覽會讓「回教圈」地區的人民親近日本,也是其目的之一。

那麼,日本政府所想像的「回教圈」,具體指的是那些地區呢?關於這一點,可以從「回教圈展覽會計畫書」上看出。計畫書上的「後援團體」首先是日本政府各機關和團體,改行後寫的是「滿洲國政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蒙疆自治政府、中國回教總會聯合會」,在此之後再行改行寫的是「土耳其大使館、埃及公使館、伊朗公使館、阿富汗公使館、各地伊斯蘭教團等」。也就是說,展覽會所邀請的

「回教圈」地區實質上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就是中國各地,這也是中日兩國交戰地區;第二才是與日本有外交關係的中東·阿拉伯和中亞地區各個伊斯蘭國家。這一系列清楚說明,日本帝國主義在中日戰爭的時間場中設定了「回教中國」這樣一個伊斯蘭的「空間」,而其「回教圈」的聚焦點是在「回教中國」上。關於這一點,也可以從邀請代表的人數比例上得到證實。

出席了展覽會的代表一共為41人,其中與中國有關地區的人員卻達到32人,包括偽「中華民國」各方面15人、「東突厥斯坦」方面9人、「滿洲國」方面6人,另外還有兩人為「土耳其·塔塔爾」(以下稱塔塔爾人)的代表(「伊黛爾·烏拉爾·土耳其·塔塔爾(Idel Ural Turk Tatar)文化協會」的遠東方面副會長和理事,而這個協會的本部當時就設在「滿洲國」的奉天。從以上邀請代表的地區和比例可以看出,回教圈展覽會從其計畫的階段開始,最大的關心就是放在中國回教身上。換言之,匆忙舉辦這次回教圈展覽會的最重要目的,就是為了加深與中國回教徒之間的友好關係。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回教圈展覽會計畫書」的「趣旨」中所述及之「事變」指的就是1937年7月7日發生的「盧溝橋事變」。

藉舉辦展覽會之機,11月18日在「丸之內日本俱樂部」的大堂召開了原本在「計畫書」中沒有出現的「世界各地來朝回教徒大會」。會上許多代表呼籲「感謝給了舉辦

如此光榮大會之機會的大日本帝國和大日本回教協會，為了緊急強化全回教徒的大同團結這一重要任務，應該確立為使其具體化今後一致協力的活動方針，大會決定「以本次會議為世界回教徒第一次大會」，「今後每年召開一次大會，明年的第二次大會在東京召開」。(註13)

毫無疑問，日本非常期待以「回教圈」的名義建立一個跨越國境的「回教空間」。然而可以看出，這個「回教空間」實際上是一個表象和實質並不完全重合的、被想像出來的二重的空間。從表面上來看，「回教圈」包括了土耳其、埃及、伊朗、阿富汗等中東、阿拉伯和中亞各國，但是這個「回教圈」是一個範圍並不清晰的空間概念，對於戰爭日本來說其最大的關心，無疑還是在於如何拉攏和利用包括「滿洲國」在內的中國的「回教」社會上。而他們的目的，就是想通過「回教圈」的途徑在中國的「回教」社會中培植一種對日本的親近感。日本帝國主義之所以會對中國的「回教」社會表現出如此大的興趣，還在於當時他們對中國的「回教徒」勢力進行了錯誤的估計：「世界上回教徒的總數達到四億，分別居住在滿洲、支那、南洋、印度、近東、中央亞細亞及阿弗利加地區。」(註14)下文還將談及，日本當時流行的一種說法為僅僅滿洲的回教徒就有 200 萬人。

以日本為中心的「回教空間」的虛像

「從來把與回教諸民族的聯合等閒視之」的日本之所以會突然想到舉辦「回教圈展覽會」，是與在這個時期先後發生了「(東京)回教禮拜堂的落成、也門國王子的來朝、日本飛機『疾風號』飛行伊朗等事件聯繫在一起的」。(註15) 1939年5月12日舉行的東京清真寺落成儀式，日本政府、東京市長都派出了代表出席，此外出席者還有川島義之大將及山本英輔大將等預備役軍官、日本社會右翼勢力首領頭山滿、駐日義大利大使、阿富汗和埃及公使代理，以及由日本國內各地和印度、中國、「滿洲」邀請來的「回教徒代表」，合計五百人以上。(註16) 所有由國外來賓都是通過當地的日本大使館和領事館進行邀請，留滯費用也由日本政府支付的。(註17) 很明顯，日本政府是想通過東京清真寺的落成，向各國回教徒宣傳日本「同情」和「寬容地理解」「回教徒」，「認真保護」「回教」，甚至對「回教學校及其他文化施設」進行「經濟援助」，具有與「回教徒」一致的價值觀。(註18)

這種製造「回教空間」的活動，並不限於東京清真寺的建立。「毋寧說，東京清真寺創建的大前提就是大日本回教協會的設立。」(註19)「為了響應(日本的)大陸回教徒政策」，(註20)「由外務省背後推動設

立」、(註21)日本成立了「以陸軍大將林銑十郎為會長的大日本回教協會」。「昭和十三年中，日本內地盛大地舉行了東京清真寺創建和設立大日本回教協會兩個大典，恰似遙相呼應一般，二月裡在北京的懷仁堂舉行了盛大的中國回教總聯合會成立儀式。……另外，十二月時在內蒙綏遠歸化城召開了西北回教聯合會的創立總會。」(註22)可以看出，「大日本回教協會」正是與這些中國「回教」社會的活動相呼應，為了將日本打扮為「回教空間」的中心而設立的機關。

但是在現實中，如果真的要將日本變為一個「回教空間」的中心，必然遇到很多現實的問題，首當其衝的就是如何解決日本的穆斯林人數極少的問題。信者雖少但卻要變身為「中心」的矛盾，在日本政府為了在戰時強化社會統制而制定「宗教團體法」時就暴露無遺。1939年4月1日帝國議會公布的「宗教團體法」第一條規定：「本法中所指的宗教團體為神道教派、佛教宗派及基督教和其他的教團（以下簡單稱為教派、宗派、教團），以及寺院及教會」，其中並沒有列入「回教」，也就是說，並沒有承認「回教」為日本的宗教團體。

「適用這一法律的教團進入文部省的管轄，承認為合法的宗教，沒有被適用的新興宗教等遭到了嚴厲的鎮壓。」(註23)但是，日本無論朝野在關於如何處理「回教」的地位問題上，都明顯表現出寬容的態度。平沼

騏一郎首相在國會答辯中明確說明：「宗教團體法中雖然沒有明確提到回教，然於本案成立之後，回教也和一般宗教相同，只要具備相當的條件，就可以適用於本法關於教會等的規定，接受公正的監督和同樣的保護。回教日後能夠具備這些條件，關於這一點我相信沒有任何能夠質疑的餘地。」(註24)

指出「建設東京清真寺的背後的主角為黑龍會」(註25)的重親知左子，注意到在「大日本回教協會」的秘密文件中有這樣的記述：「由於回教徒大眾至今依然（愚昧）無知，只要是在沒有遇到外敵時，就會互相排擠，因此今天對回教徒的再組織（工作）非常緊要。……回教徒抱著滿腔信賴期待著日本的奮起，那麼我國就要從現在開始認識到自己肩負的使命，不負這些回教徒的信賴而毅然推進大東亞的建設。」(註26)很明顯，受到「大日本回教協會」重視的不是為了「回教徒」的「回教政策」，而是為了讓日本得到指導「回教徒」地位的回教政策。

有日本學者指出，1939年的「回教公認問題」，「與建設東京清真寺、舉辦回教圈展覽會一起，由黑龍會主導的製造日本接受伊斯蘭受容的三大對外表演而已」。(註27)換言之，為了製造一個日本處於「回教空間」中心的虛像，日本帝國主義可謂費盡了腦力和財力。

在「滿洲」發現「回教」

在中國的東北地區，日本侵略勢力很早就注意到「回教」的作用。1922年，大連清真寺落成。按照日本方面的說法，大連清真寺的建設，是「以巴什基爾民族代表庫爾班加里也夫為中心，目的在於促成日本和支那人的回教之間的大同團結、使正在興起的泛伊斯蘭主義不斷具體化」。(註28)也就在這一年的年初，剛剛就任滿鐵理事的松岡洋右，將在大連清真寺建設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庫爾班加里以「囑託」名義招進滿鐵本社的調查課(日後的滿鐵調查部)以「負責回教方面事務」。庫爾班加里出身於俄羅斯的巴什基爾地方。由於與塔塔爾人在地緣、民族、語言上的親緣關係，20世紀初期流亡國外的塔塔爾人和巴什基爾人被統稱為塔塔爾人。庫爾班加里於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時期流亡到中國奉天，1922年移居大連。按照1923年8月15日「關東廳警務局臨時報第三八〇號」的說明，庫爾班加里在大連的活動內容為「促成日本和支那人的回教之間的大同團結，使正在興起的泛伊斯蘭主義不斷具體化，建設大連回教寺院，以此為根據地團結在滿十五萬回教徒，並以此為基礎策劃團結支那四百萬回教徒。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在支那各地建設回教寺院，以使東西之間回教徒之間的來往聯絡更加方便。」(註29)

1924年，庫爾班加里從滿鐵退職移居

到東京。通過對他在滿鐵的工作內容、和移居到東京之後的工作內容進行比較，可以大致推測出他移居東京的原因。關於庫爾班加里在日本的活動，日後在他被驅除出日本國外時，日本外務省人員曾做過如此評價：「關於他雖有種種流言蜚語，但至少不得不承認他在我國近十五年間的回教及回教問題普及上所做出的功績。」(註30)可以說，庫爾班加里移居東京是他在滿鐵調查部工作的延長，而其工作對象已不僅是「在滿十五萬」和「支那四百萬」、而是世界上所有的「回教徒」，他要向他們製造和傳達一個親近伊斯蘭、在此伊斯蘭教的信仰能夠得到尊重、伊斯蘭教徒的生活能夠安寧的日本·東京形象，從而將日本化妝為世界「回教圈」的中心。1932年，即「滿洲國」成立當年的11月，庫爾班加里以「在日本回教徒聯盟會長、東京回教徒團體長、東京回教學校校長」的名義回到「滿洲」，「與在滿二百萬回教徒的代表者一起，就將來的方針進行了協商」。(註31)據〈滿洲的回教〉一文提供的數據，當時在「滿洲」各地居住的俄系塔塔爾人約為1萬5千人，大半居住在哈爾濱和海拉爾。

然而，日本帝國主義為什麼會從「回教」的角度關注「滿洲」呢？一位日本外務省的調查部人員在其名為〈滿洲的回教〉的報告中，做出如此回答：「滿洲的回教徒雖然非常貧弱，其自身沒有什麼值得研究的價值，但是由於回教徒居住於蘇聯與支那之間

的帶狀地帶中，在北支方面雜居著大量的回教徒，因此位於其最東端、直接與日本文化接觸的滿洲回教徒，現在值得更加矚目和研究。」（註32）因此，如果「將（滿洲）二百萬回教民族僅僅看作為一個宗教集團」，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註33）

關於「滿洲」的塔塔爾人社會在對當地回教徒社會關係上的作用，可以通過大久保幸次在《現代回教圈》一書中的分析中看出：「要之，從哈爾濱到新京、奉天、海拉爾、滿洲里等地，居住在這裡的伊黛爾·土耳其人是從俄國東南部來的移民，是隨著俄國人的東方經營而跑到遠東的商人群體。因此可以說滿洲的伊黛爾·土耳其族的歷史幾乎就是以追求商業者的生活為中心。」（註34）「將滿洲的伊黛爾·土耳其人的存在與居住於日本的同系的流亡者聯繫在一起議論並非無益。因為兩者在各個方面都保持著緊密的關係。」（註35）也就是說，如果能夠操縱日本的塔塔爾人社會，就能夠通過「滿洲」的塔塔爾人社會，進而將整個「滿洲」的「回教」社會牢固地牽制在以日本為中心的「回教圈」中。

塔塔爾人社會的活動，也說明了日本帝國主義設計的以日本為中心的「回教圈」的半徑，事實上已經遠遠超越了已經進入日本勢力範圍中的「滿洲」，甚至覆蓋了中國的西北部地區。「隨著事變的爆發，受到華北及北京當地回教徒極大信賴的川村狂堂為了統一滿洲的回教徒而在長春方面出

馬，……從大正末期人數逐漸增加的居住於名古屋的塔塔爾系穆斯林，原本彼等流亡日本的路線就多為經由滿洲的海拉爾、哈爾濱、舊奉天，所以當此次滿洲方面的動靜開始出現異常，他們立即響應並迅速開始行動。從中央亞細亞的突厥斯坦河畔到烏拉爾山麓地帶，居住在這裡的突厥系穆斯林們，現在開始隨著日本，對戰鬪中的滿蒙的天地開始抱有深深的關心。」（註36）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對蒙古地區的關心不斷提高，「因為內蒙地帶才是通過絲綢之路聯接東西突厥斯坦的回教徒密集地帶，進一步橫斷中央亞細亞大草原階梯地帶，只要一路西進就可以到達內陸的土耳其的伊斯蘭堡的最短距離的起點。」（註37）

新疆的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對日本的意義也正是在這個前提下被發現的。1937年底，一位名為「鈴木」的日本人與一位姓張的「滿洲國人」（張子文）一起到麥加朝覲。翌年3月16日，日本駐埃及橫山公使向廣田外務大臣送出一封極秘電報，報告說：「鈴木正在麥加與莫合默德、司儀江可及另外四名新疆人就到日本一事進行協商。」廣田外務大臣在接到電報後，第二天即電指示：「馬上進行所有人一起歸朝（即來日本）的準備，如其經費不足時請代為支出。」但是，橫山公使代為支出的200埃及磅，最後卻是由「參謀本部經理室的前岡少佐」返還的。（註38）該鈴木大約就是「鈴木剛」，根據中國方面的史料，他在麥加時

還曾經試圖接近當時前來朝覲的青海省主席馬麟。(註39)這些都能說明，戰爭日本帝國主義確實企圖利用中國的「回教」向中國內地、西北部和新疆方向拓展勢力範圍。

日本的陸軍和外務省其實以前就有利用「回教」發展在中國勢力範圍的想法。在1938年的五相會議上正式提出「回教工作」(註40)以前，在外務省、陸軍省及關東·關西經濟界的支持下，1936年12月19日，日本成立了以原內閣總理大臣林銑十郎為顧問(會長)、遠藤柳作為理事長、佐久間貞次郎為常任理事的「回教文化協會」。1939年9月19日，「大日本回教協會」誕生。「大日本回教協會」為日本史上「至今最大規模、最強陣容」(註41)的伊斯蘭教關係團體，第一代會長為原內閣總理大臣林銑十郎。關於林銑十郎就任「大日本回教協會」第一代會長一事，坂本勉如此分析道：「這一人事，可以說是1937年的盧溝橋事件、以及隨之月中戰爭的全面爆發後軍部是多麼重視伊斯蘭政策的象徵。」(註42)然而毫無疑問，直到太平洋戰爭開始之前，以「回教圈」話語為象徵的建設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回教空間」的活動，一貫都是以支援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為根本目標的。

結語

日本帝國主義之所以重視「回教」，就是希望將「回教」變為支持他們侵略中國的

工具。不得不承認，日本通過「回教圈」的話語在中國「發現」和製造與日本之間的親近感的努力上，也的確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在這個問題上，似乎更加值得深思的是：儘管本來並沒有伊斯蘭教傳統，日本帝國主義為什麼卻會想到使用「回教圈」的概念在東亞地區製造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回教空間」呢？

其實，通過這個可以看出一些日本帝國主義不同於其他列強國家的特質想到：與歐美國家當年「向落後的殖民地輸出先進文化」的想法不同，日本帝國主義更傾向於通過「發現」「共通性」，而在其侵略的前線和矛頭所向之地「發現」和製造一種與戰爭日本之間的「共同體」意識。筆者曾經指出，日本從發動戰爭之前就製造中華思想說，利用它在中國邊境地區的民族集團中尋找歷史上遭受過中國大國思想迫害的共同歷史記憶，而本文所述在新疆地區「發現」「同胞民族」、在東亞「發現」「回教圈」的同志、以及在發動太平洋戰爭以後發明「大東亞共榮圈」的話語中，更是露骨地打出了拯救同類的旗幟。

日本帝國主義之所以採取這種手段，當然是出於將其侵略戰爭進行正當化的目的。但是要讓一個人產生一種新的「共同體」意識，其實質就是要他放棄原有的「共同體」意識。換言之，日本帝國主義通過「回教圈」的概念在中國「發現」和製造與日本之間的「共同體」意識的目的，正是為了讓中

國國民中的回教徒放棄原有的「共同體」意識。而在中日戰爭的背景下中國國民開始形成的「共同體」意識，當然就是「中華民族」的意識。眾所周知，正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才使中國國民的民族主義意識得到了空前的覺醒。

以中華民族國家思想為代表的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其實是受到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啟發，從日本學習到的。從這種關係中我們也可以察覺到為什麼與歐美帝國主義在侵略的前線宣揚輸出「先進文化」不同，日本帝國主義更加熱衷於在侵略的前線發現和製造「共同體」意識的原因。這就是，近代日本在動員國民上發揮了極大作用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事實上也成為了一道嚴格區別內外、因而折射出日本的對外擴張缺乏正當性的標誌。因此，日本帝國主義要想將其對中國的侵略和擴張進行正當化，就要「發現」一個能夠突破「民族」和「民族國家」範疇的新的「共同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宗教也許是成就一種新的共同體意識的最好手段，但是由於其中日本中心論的虛構，日本帝國主義的「回教圈」話語，最後不過只是成為一道翻越了投射到了中日兩個民族國家高牆之間的幻影而已。

【註釋】

1. 「回教徒視察団の日程」，《記錄回教圈展覽會：全世界回教徒第一次大會來朝回教徒視察》，1940年，頁23-25。
2. 王柯，《東トルキスタン共和国研究—中国の

イスラムと民族問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1995年），頁44-48、79。

3. 蒙古軍事顧問部調査部，「回疆獨立運動ノ概説（獨立戰爭支那事変迄）」，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21598400，回疆獨立運動の概説，《森川史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4. 王柯，《東トルキスタン共和国研究—中国のイスラムと民族問題》，頁39-40。
5. 「第2章 マフムツドの対日工作の実状」，蒙古軍事顧問部調査部，「回疆獨立運動ノ概説（獨立戰爭支那事変迄）」，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21598400，回疆獨立運動の概説，《森川史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6. 「結言」，蒙古軍事顧問部調査部，「回疆獨立運動ノ概説（獨立戰爭支那事変迄）」，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21598400，回疆獨立運動の概説，《森川史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7. 「結言」，蒙古軍事顧問部調査部，「回疆獨立運動ノ概説（獨立戰爭支那事変迄）」，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21598400，回疆獨立運動の概説，《森川史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8. 「結言」，蒙古軍事顧問部調査部，「回疆獨立運動ノ概説（獨立戰爭支那事変迄）」，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21598400，回疆獨立運動の概説，《森川史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9. 「三八六八二」11，回教圈展覽會，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2294800，本邦展覽會關係雜件 第二卷（I-1-6-4-5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0. 「參加日回教展覽之全滿回民代表一行6人於寒風凜冽中啓程東渡」，滿洲回教協會，《回光月刊》，第1卷第12期，頁47。
11. 「回教圈展覽會來朝代表者」，《記錄回教圈

- 展覧会：全世界回教徒第一次大会來朝回教徒視察団》，1940年，頁3。
12. 「回教圏展覧會計画書」11，回教圏展覧会，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2294800，本邦展覧会関係雑件第二卷（I-1-6-4-5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13. 「世界回教徒第一次大会概要」，《記録回教圏展覧会：全世界回教徒第一次大会來朝回教徒視察》，1940年，頁20-22。
 14. 「回教圏展覧會計画書」11，回教圏展覧会，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2294800，本邦展覧会関係件 第二卷（I-1-6-4-5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15. 「回教圏展覧會計画書」11，回教圏展覧会，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2294800，本邦展覧会関係雑件 第二卷（I-1-6-4-5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16. 「東京回教団寺院落成式典開催状況ノ件」，「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ノ回教関係 第二卷 分割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2533500，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ノ回教関係 第二卷（I-2-1-0-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17. 廣田外相発在ベルルート小長谷領事宛，「東京回教礼拝堂ニ関スル件」，「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ノ回教関係 第二卷 分割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2533500，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ノ回教関係 第二卷（I-2-1-0-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18. 「日本ト回教徒ニ関スル新聞論調報告ノ件」，「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ノ回教関係 第二卷 分割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2533500，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ノ回教関係 第二卷（I-2-1-0-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19. 小村不二男，《日本イスラーム史》（東京：日本イスラーム友好連盟，1988年），頁94。
 20. 田村愛理，〈回教圏研究所をめぐって——その人と時代——〉，《学習院史学》，25（1987年），頁27。
 21. 「回教圏展覧会開催ノ件ニ関シ調査部三浦課長ヨリ左ノ通申越シ」11，回教圏展覧会，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2294800，本邦展覧会関係雑件 第二卷（I-1-6-4-5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22. 小村不二男，《日本イスラーム史》，1988年，頁95。
 23. 重親知左子，〈宗教団体法をめぐる回教公認問題の背景〉，《大阪大学言語文化学》，14（2005年），頁132。
 24. 小村不二男，《日本イスラーム史》，頁429。
 25. 重親知左子，〈宗教団体法をめぐる回教公認問題の背景〉，頁143。
 26. 重親知左子，〈宗教団体法をめぐる回教公認問題の背景〉，頁143。
 27. 重親知左子，〈宗教団体法をめぐる回教公認問題の背景〉，頁143。
 28. 関東庁警務局，「臨時報第三八〇号、在満回教徒ノ統一計画」，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41583400，関東都督府政況報告並雑報 第十七卷（I-5-3-12_018），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29. 関東庁警務局，「臨時報第三八〇号、在満回教徒ノ統一計画」，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41583400，関東都督府政況報告並雑報 第十七卷（I-5-3-12_018），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30. 「回教研究会、外務省欧亜局第一課今岡囑託報告」，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2533500，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ノ回教関係 第二卷（I-2-1-0-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31. 「在日本回教徒連盟会長渡來東上ノ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2533500，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

- 雑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 (I-2-1-0-1_2_00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32. 「満洲の回教」，「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雑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 分割1」，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2533500，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雑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 (I-2-1-0-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33. 「満洲回教民族ト現在ノ動向」，「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雑件／回教關係 第一卷 分割2」，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2533100，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雑件／回教關係 第一卷 (I-2-1-0-1_2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34. 大久保幸次、小林元，《現代回教圏》(東京：四海書房，1936年)，頁307。
35. 大久保幸次、小林元，《現代回教圏》(東京：四海書房，1936年)，頁307。
36. 小村不二男，《日本イスラーム史》，頁76。
37. 小村不二男，《日本イスラーム史》，頁100。
38. 「回教徒ノ本国渡來ニ関シ助力方ノ件」，「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雑件／回教關係 第二 2・満州国」，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2533500，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雑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 (I-2-1-0-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39. 鐵維英、李學忠，《中國穆斯林朝覲紀實》(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90-191。
40. 王柯，〈日本侵華戰爭與『回教工作』〉，《歷史研究》(中國)，2009年第5期，頁87-105。
41. 小村不二男，《日本イスラーム史》，頁94。
42. 坂本勉，〈アブデュルレシト・イブラヒムの再來日と蒙疆政権下のイスラーム政策〉，坂本勉編著，《日中戦争とイスラーム—滿蒙・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統治・懐柔政策》(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8年)，頁26。